

“两灌”人民的骄傲

江苏省灌云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杨肇庭

□ 张道平

杨肇庭，江苏灌南县人，1909年11月出生，1932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至1941年1月，先后任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三团二营连政治指导员，宿沭海中心县委第一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部长，灌云县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部长，沭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45年秋天起任灌云县委书记。1949年5月至1951年12

月任灌云县委书记。此后，又先后任泗阳县委书记和淮阴地委组织部部长。1958年4月至1960年7月任灌南县委书记。

离开灌南后，任淮阴地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73年起历任淮阴地委党校副书记、副校长，淮阴地区机关党委书记，地委统战部部长，地委常委、纪委书记。1983年3月离休，享受正厅级待遇。2002年4月30日逝世，享年93岁。



在围绕“追寻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这一选题展开采访工作之前，记者先行前往江苏省党史档案室查阅了一些相关史料。翻开《中共灌云县地方史》，找到灌云县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的名字时，不禁有些吃惊。杨肇庭？这不是灌南建县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吗？

因为记者是灌南人，也了解一些家乡的历史。而灌南与灌云的关系，也甚是特别。灌南于1958年建县，正是由原灌云县与涟水县部分乡镇合并而成的。对于杨肇庭，记者略有耳闻，不过也仅限于知道其是一位老革命家而已。

为了了解更多信息，记者随即与灌云县新闻中心主任葛志亮取得了联系，他向记者提供了另一个信息：杨肇庭的老家就在灌南县北陈集镇。由于记者对灌南较为熟悉，所以决定直奔北陈集镇。

最初的寻访

4月的苏北，桃红柳绿，春意盎然。4个多小时后，车已到达北陈集镇的街头。在向路人询问去路的时候，一个倪姓老人表示，杨书记早在2002年就去世了，其家人早就全部搬到淮阴（现淮安）住了。因为杨书记参加革命太早，自己又是后搬到北陈集的，所以，虽然杨老在世时也曾回老家看过几次，但了解得并不多。问答中，围观人群渐多，却再无人提供更多线索与信息。就在将要离开的当口，一位耄耋老人叫住记者，表示自己跟杨书记有过交往。

老人名叫纪怀成，于20世纪60年代供职于灌云县内某银行。纪老在淮阴（当时的灌云归淮阴地区行政专署管）参加为期3个月的岗位培训时，一天晚上，培训主办方组织观看演出。当主持人请出淮阴地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肇庭讲话时，纪怀成喜出望外，因为他早就听说杨肇庭是北陈集出来的老革命，现在能够这么近距离地倾听他的讲话，是做梦也梦不到的。杨肇庭在台上讲得激情澎湃，他则在台下听得热血沸腾。待杨肇庭讲完落座后，纪怀成便跑到他身边向他问好并简单介绍自己是灌南陈集街人。知道自己遇到了小老乡的杨肇庭很高兴，热情地向他问长问短，包括他的家庭、工作等等。知道纪怀成也是来参加岗位培训的，杨肇庭语重心长地说：“能在银行工作不容易啊，你

一定要好好学，把工作干好，为我们北陈集人争光。”稍顿片刻，他又说：“这个星期天，你来我家里吃饭，改善伙食，我要亲自包饺子给你吃。”激动之余，纪怀成一口答应了。星期天，当他如约而至的时候，杨肇庭已经坐在桌前包饺子了！后来的3个月里，杨肇庭每个周末都叫他去家里吃饭……

“虽然我也不好意思去，但杨书记盛情难却，而且在他家那些天里，他还常常教育我如何做人做事做好工作。他很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纪怀成老人还给记者提供了杨肇庭侄儿在淮阴的联系方式。

继续追寻

欣喜之余，记者急忙又驱车前往灌南县宣传部，希望在宣传部的帮助下得到更多的有关杨肇庭的信息。灌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在问清此行目的后，随即电话联系了县党史办同志并又特地从县新闻中心调度了一名记者陪同采访。

次日，记者赶到了灌南县党史办公室。据该办主任李锦华介绍，在杨肇庭带领下的两年多里，灌南面貌改变极大。农业生产大丰收、工业突破空白、交通闭塞局面得到改善、小学教育得到普及、全县医疗网也得以建立……

在李锦华的介绍里，我们还得知，杨肇庭做县委书记的时候，不管是大搞水利、积肥或是夏收、秋收，都是下到劳动第一线的。

1959年初，灌南县委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精神，大搞“积肥”运动。杨肇庭与其他县委领导一道带领县直机关、企业、工厂、医院等单位500余人进行了为期4天的积肥突击。那4天里，杨肇庭与所有的劳动者一样，奋战在积肥第一线。他身先士卒、手提肩挑，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积肥点。在他的带领下，4天共积肥4.21万余担……

1960年夏，麦收在即。就当时的情况，农业靠天吃饭，麦收时如果遇到洪涝天气，丰收就会成为奢望。所以杨肇庭在安排好全县的麦收工作以后，深入堆沟、苏光等公社指挥麦收。而不管到哪个公社，杨肇庭都会在查看麦收情况之余，与众多老百姓一道在麦田里挥动镰刀，抢收麦子。那年，大田里的蚊虫特别多，不管怎么防备，都会被虫子

叮咬。但杨肇庭根本就不在乎，他一边挥镰割麦，一边鼓励大家抓紧时间抢收麦子……就算汗流浹背，也顾不上擦一把。

赶赴淮安

几经辗转，数次联络，我们终于见到了今年已经73岁的、杨肇庭的侄儿——杨开展。老人住在淮安市区的一个名为“水畔花城”的小区，在见到记者的刹那，他显得很激动：“真想不到，现在大家还记着我伯父。”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伯父在灌南的城市建设、工农业发展上的高瞻远瞩。灌南县城的人民路和新兴路都是在1958年设计兴建的，历经50多年，到现在也不落后，因为我伯父当年就把灌南县城的规划定性为现代化的小县城。此外，现在新安镇境内的中心河、郑于大沟等都是伯父当年做的，到现在还在灌南的防洪排涝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任职的那几年里，灌南还建起了印刷厂、面粉厂、酒厂、棉织厂以及一个小型火力发电厂，这些厂子在灌南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谈吐间，老人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对工作，杨肇庭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对同事、对朋友，亲切友好、热情洋溢，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杨开展的父亲是杨肇庭的亲弟弟，与杨肇庭同年参加革命，1940年护送纵队政委去山东邳北的路上牺牲。时年仅两岁的杨开展便成了孤儿。成年后，杨开展家庭经济情况较差，有一年身体不好，家庭生活捉襟见肘，快要揭不开锅了。思量多次，他准备向灌南民政申请救助。不知怎么的，这事被杨肇庭知道了。他立即打电话给民政部门，“你们不得批准杨开展的救助申请。他要是没钱看病，没钱生活，叫他打电话来找我，我负责就行了。你们要把精力放在

比他更需要救助的人身上。”

2002年，杨肇庭病危，偶有清醒的时候，便对身边的亲人嘱咐再三：“你们记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一定要体谅党和政府的困难，不管自家能不能安排或者安排到什么程度，都不能给组织增添麻烦。”如此地，反复多次，甚至就在其进入昏迷前还念叨着：“……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我家伯父啊，一心就想着别人，生怕家里人给公家添麻烦……”叹息间，杨开展老人的眉宇间有掩不住的自豪悄悄洋溢。

精神永存

两天的采访，我们了解到了一个平易近人、见识高远的县委书记。乘胜追击，我们决定前往灌云县。

记者通过电话与灌云县新闻中心葛主任取得联系，并请他与当地党史办作了沟通。因此，我们离开淮安后便直奔灌云县党史办。党史办主任夏玲早已在办公室等候，并给我们讲述了自己所了解的关于杨肇庭的事情。灌云史称洪水走廊，经常为水患所害。杨肇庭任灌云县委书记时，正值该县水灾之后。由于土地严重碱化，加之耕作粗放，肥料缺乏，亩单产很低。据当时的数据统计，逃荒、断炊户占到了区总户数的近一半。

面对这种情况，杨肇庭在积极争取上级救助的同时，成立了专门的救灾机构，号召全体党员、干部，采取群众自助、生产自救等措施，克服困难，战胜灾荒。在生产自救中，杨肇庭根据不同情况，引导和组织灾民采取不同方式，因地制宜地发动群众打石子、织席子、做小生意、捕鱼摸虾、采草药、挑野菜等。

与此同时，据夏玲介绍，杨肇庭结合救灾工作，积极动员当地民工在半年时间里分三个阶段大搞水利工程。这些举措的成果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的参与和支持的热情都空前高涨，不少妇女也参与到了兴修水利中。

夏玲说：“除了这些，根据形势的迅猛发展，杨肇庭还积极进行恢复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工作，为此后灌云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追寻工作结束后，我们回到灌南，该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仔细询问了我们采访的过程。她用一句话评价杨肇庭：“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竭尽心智，无论是对于灌南还是灌云，都作出了极大贡献，是‘两灌’人民的骄傲！我们怀念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摘自2011年5月23日《中国县域经济报》）



改变历史的三天

——遵义会议在生死关头挽救中国革命

从建党到开国，中国共产党走了28年，时空坐标的中点落在1935年的遵义。一场为期三天的会议，改变了中国历史。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召开是14年，从遵义会议召开再到新中国成立也是14年。中国革命前14年苦苦探索，几经起落；后14年昂首阔步，走向胜利。

历史何以在遵义转折？

转折，舵手一易上新途。

隆冬腊月，娄山关的雪纷纷扬扬，遵义城的人熙熙攘攘。

记者登上遵义会议会址的二层，木质楼板嘎嘎的响声仿佛穿透了历史的尘封。

缓步走进这个改变中国历史的会址，眼前的国家一级文物——长方形会议桌，仿佛无声地诉说着那三天的字字句句，墙上的纪念馆镇馆之宝——挂钟，似乎不断回响着那三天的分分秒秒。

86年前，也是这股时节，窗外天寒地冻，屋里却在激烈争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

“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

据《红军长征史》记载：“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桌上的火盆虽然难以驱散满屋的寒意，但毛泽东铿锵有力的发言却让与会的年轻革命家们心头滚烫。躺在一张藤躺椅上参会的王稼祥带着枪伤、发着高烧，听完发言后坐直了身子，为毛泽东热烈鼓掌，他坚决提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部队。

会议形成了12000多字的总决议，总结了失败教训，通过了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建立

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决定北渡长江创建新的根据地等决议。伍修权在遵义会议结束后写下了：“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自主，批判教条定方向。

领袖不是从天而降的。长征前毛泽东虽已被撤销了军事指挥权，但他始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保持着巨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路走来，他不断争取党和红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努力挣脱“左”倾冒险主义的枷锁。以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等为前奏，毛泽东在军事上的精准预判和卓越才能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红军上下逐渐形成了

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信任。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和王稼祥在贵州黄平曾有一段“橘园对话”。王稼祥问：“红军下一步怎么办？博古、李德再这么搞下去能行吗？”张闻天答：“我考虑再三，他们再来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

“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年轻的革命家们经历了激烈的争论，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军事指挥者教条执行着共产国际的意图，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民族脊梁坚决要求走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独立自主之路。遵义会议正是以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胜利而彻

底结束了这场争论。”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遵义会议精神研究”项目首席专家徐静说。

传承，红色基因育新机。

“遵义的红色遗迹还远远没有发掘充分。”遵义会址纪念馆原馆长雷光仁认为，“十四五”期间国家将重点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这对于遵义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不仅将带动遵义“四史”研究的突破，还能够让市民和旅游者通过更好的旅游体验接受红色文化滋养。“每年都有300多万人到会址参观，随着长征文化公园的建设，将有更多游客在遵义探索全域红色旅游的新发现。”

“我计算过，红军长征一天至少要走40公里，相当于每天走6万多步，而且都是在与恶劣的环境和凶恶的敌人的斗争中走完的，如果没有非凡的信念支撑，这一切都难以想象。”来自遵义红花岗区的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已经讲了7年红色故事，她的书房里珍藏着她的爷爷——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老红军孔宪权的生平照片。“我通过整理爷爷的故事了解了整个长征，再把这些故事带到学校，讲给孩子们。”孔霞说，她业余时间都用来整理和传播遵义会议和长征的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的交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脱胎换骨。2018年实现了公路的村村通、组组通。已建成和即将建成的6条高铁，让贵州从西南一隅变成了连接西南和华南、中南、西北的交通枢纽。最令贵州人自豪的要数万山丛中那些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的桥：北盘江大桥、坝陵河大桥、鸭池河大桥……红军战士曾经用双脚丈量过的黔山大地，如今已再无险途。

（摘自2021年2月1日《光明日报》）



□ 朱习文 洪一文 孙敏坚

刘少奇的『四不准』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到工厂、农村、学校等调查。他经常以普通群众的身份，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每次外出，他都要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重申自己订的“四不准”：每到一地，不准人家接送；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不准向人家要东西，人家送上门来也要婉言拒收；参观时不准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刘少奇自己严格遵守并督促工作人员执行这些规定。他每次外出视察，不要地方上招待。有时为了减少住宾馆、招待所的麻烦，就住在火车上，吃一点简单的饭菜。有时地方同志为了表示一下心意，送点土特产给他，他一律退回，实在无法退回的，就照价付款。

刘少奇平时吸烟比较多，但他不吸太好的，平常就是“大前门”香烟，偶尔还吸“恒大”牌的。1958年在成都开会时，秘书拿来一包云烟，请刘少奇吸一吸，看看烟的质量怎么样。刘少奇吸过后说：“不错。”秘书说：

“那就去弄一些来？”刘少奇立刻说：“要付钱！人家不要钱，我可不要烟。”后来，刘少奇特地找秘书要来看了买烟的发票，才放心。

（摘自2021年3月12日《湖南日报》）

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

□ 张莹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直接以党性命名的中央文件。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斗争的需要，采取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党员人数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随着抗战形势发生复杂变化，党和军队中也出现了非常危险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有的根据地出现了各自为政甚至对抗中央的问题；而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分子及其他反动势力采取多种方法分裂、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中共中央认识到，如果不及时纠正这些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必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使党和革命受到损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如何增强全党对党性的认识问题展开专题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

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件）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他进一步提出：“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负责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个《决定》于7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

这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决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自觉性和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决定》以中央文件的权威性明确了党性的概念、内涵和增强党性的方法，从而引起了全党对党性问题的重视和深入思考，增强了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性意识，端正了党员干部的政治态度，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对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此后，党性概念开始更加广泛地进入了党的建设领域，党性要求成为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决定》也成为此后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重要文件之一。

（摘自2021年5月24日《北京日报》）